

林译小说序跋的“西学为用”思想

邹自振¹, 郑瑶²

(1.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21;

2. 赣东学院人文学院, 江西抚州 344100)

摘要: 林纾翻译的180多种欧、美、日诸国小说, 涵盖了历史战争、英雄传奇、游记探险、侦探说案、爱情婚姻、志怪说鬼等题材, 品类丰富, 他还为这些翻译小说写了70余篇序跋。梳理这些序跋, 发现林纾翻译的动机与目的主要是“西学为用”, 以此报国。而“西学为用”的思想, 又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历史沿革、教育文化、社会人伦和文学观念等方面。林纾以“守旧”自称, 但通过对这些序跋中的思想进行提炼和分类, 可以窥见不懂外文的林纾也具有国际视野, 他着眼于了解西方, 倡导西学却不仰视西学, 注重汲取西学智慧以救国。由此观之, 更能凸显林译小说的价值和林纾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林纾; 林译序跋; 西学为用;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6)02-0137-07

Lin Shu's idea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use" i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his translated novels

ZOU Zizhen¹, ZHENG Yao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2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Gandong University, Fuzhou 344100, China)

Abstract: Lin Shu translated more than 180 novels from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vering historical wars, heroic legends, travelogues and adventures, detective stories, love and marriage, ghost stories and other themes. He also wrote more than 70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for these translated novels. By sorting out thes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he motives and purposes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are summarized, which are mainly "Western learning for use", so as to serve the country. The idea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social ethics and literary concepts. Lin Shu claimed to be "conservative", but through the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thoughts in thes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it can be seen that Lin Shu, who did not understand foreign languages, also had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e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West, advocated Western learning but did not look up to Western learning, and paid attention to absorbing Western wisdom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can highlight the value of Lin's translated novels and Lin Shu's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in Shu;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Lin Shu's translated novels; Western learning for use; cultural significance

如果说严复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者, 那么, 林纾则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之数量及译文之魅力而享誉文坛者。林纾翻译之独特性堪称空前绝后: 他自己不谙外语, 全凭他人口述

而笔录之, 这在世界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林纾一生共翻译小说181种, 涉及11个国家107位作家, 不仅数量大, 而且涉及面广, 涵盖了历史战争、英雄侠义、游记探险、侦探说案、爱情婚姻、

志怪说鬼等题材。林纾的翻译小说数量之多、速度之快,可谓达到惊人程度,几乎囊括了当时欧美国家主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其间的合作者也多达20人左右,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

此外,林纾为其翻译小说所作的70多篇序跋也融萃了他的思想精神。学界对林译小说序跋已多有关注,如从翻译的角度关注副文本(序跋)阐述林纾的翻译思想、译介方式、翻译规范等^[1],还有从传播、话语模式、序跋词表等角度聚焦林纾序跋中展现的政治思想^[2]、爱国情怀^[3]、文化自觉^[4]、现代性观念^[5-6]等内容,涉及较全面。而细致爬梳林译小说的序跋,会发现守旧的林纾思想上并不完全是泥古不化的,将其置于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会挖掘出更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启示。必须指出的是,林纾之所以从事文学翻译,除了早期个人排遣寂寞,更多的是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他在序跋中提到西方的历史、政治、教育、风俗、思想等,从多方面汲取西学智慧并将这些与中国进行比较,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展现出浓厚的“西学为用”的思想。

一、德政止乱:君主立宪的历史反思与政治思想

林纾翻译了许多历史军事类的小说,他从这些相关的历史题材中总结西方的历史经验,提出政治思想。他在《〈金风铁雨录〉序》中分析小说中的英国雅各当权时镇压了蒙茅动乱却不修内治,导致乱兆难以挽回,提出“止乱在德、在政,不专恃兵力”^{[7]57}。在《〈英国大侠红鬃蹄传〉序》中,他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以流血为善果,此史家所不经见之事。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俾知好为改革之谈,于事良无益也。”^{[7]95}这里“改革”是指革命的意思,林纾认为革命牺牲不适宜中国,在《〈玉楼花劫〉序》中他提到“究竟法国初变共和,昏乱之事,亦惨无天日。此时事实,证之吾华史书,都无一似”^{[7]82},而有了宪法限制,“则君民均在轨范之中”^{[7]95},这样便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建立政权后仍继续动荡的情形。林纾对君主立宪抱有较高的评价,回溯历史,这种思想在他开始从事翻译的时候(1897年),在戊戌变法的前夕,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但当维

新运动失败后,他对君主立宪制的坚持便落伍于时代了。

他对君主立宪制的推崇,并不是坚持保皇,而是因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较为和平,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后也没有出现大的动荡。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林纾出生于福州,这让他对英国的强盛印象深刻,这也是他推崇英国更迭政权方式的原因之一。他在《〈残蝉曳声录〉序》中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易而共和难”^{[7]105},所以建立政权之后,选择何种政治制度治理国家很重要。“此书论罗兰尼亚事至精审,然于革命后之事局多愤词。译而出之,亦使吾国民读之,用以为鉴,力臻于和平,以强吾国。”^{[7]105}由此还可看出,他追求和平,是为稳定局势以强大国家。而从个人心理来说,林纾推崇君主立宪制,或许还有饱经丧乱之人对和平稳定的企望。

另外,他还在序跋中体现了实业兴邦的思想,如《〈爱国二童子传〉达旨》:“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7]67}他认为实业是西人之精髓,翻译这篇小说是为宣告天下学生,治实业以自振。

从历史进程看,林纾“西学为用”的历史反思与政治思想确实存在因循守旧的一面,但又不能否认,他对君主立宪制的认同、实业兴邦的宣扬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内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其说林纾对君主立宪制的坚持带有一丝君主制的“遗民”情怀,不如说他在对比英国与法国政权更迭与政治制度之后,渴慕国力壮大与和平的稳定局势,只不过他并没有更深远的眼界,没有看出旧中国的沉痾难以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

二、开民智、守人伦的教育思想

林纾在多篇翻译小说的序跋中提及西方教育,他称《伊索寓言》是“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7]6}(《〈伊索寓言〉叙》),还比之中国的寓言作品,认为“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实未有如伊索氏者也”^{[7]6}。这里他倾向于从《伊索寓言》中让孩童开蒙,学习西方启蒙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林纾还重视家庭教育,他在《〈彗星夺婿录〉序》中提及“果家庭教育息息无诡于正,正可借资是书,用为鉴戒,又何为病其污秽不足以寓目”^{[7]96},将

《彗星夺婿录》作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而《深谷美人》写孝友贤女的故事,他在序言中说“使读者心醉其家范与其德性,冀其风俗之变”^{[7]112},将此小说作为家庭教育的正面引导。

林纾还重视女子教育,他不反对追求女权,但同时也要注重女学,这样才能风清气正。在《〈蛇女士传〉序》中他明确提出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谓女子有学,且勿论其他,但母教一节,已足匡迪其子。”^{[7]91}林纾批判《蛇女士传》中一味追求女权的女主人公荡检,并延伸到追求女权也要倡导女学,如果不学就易流于孟浪轻佻,于社会风气有碍,如《彗星夺婿》一样作出古今未有创局的夺婿之事。林纾借西方小说正反申说女子从学的重要性,批判西方女权带来佻荡之风,其言貌似带着传统儒教的枷锁,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林纾也试图矫正中国民众对西方文明的误解,告诉民众对西方文明不要有片面认知,既不盲目崇洋,也不自大轻视。他在《〈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序》中对百死赴亲侧的美洲孩童赞赏有加,打破了对欧美人的成见,“以欧、美人人文明,不应念其父子如是之切”^{[7]18}。面对狡黠者枉顾父子天性、追求自由的呼号,林纾对此非常不认可,“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如是也”^{[7]18}。他称扬青年人谈论及倡导变法,但“云父子可以无恩,则决然不敢附和”^{[7]19},坚守人伦道德的底线。例如,他在《〈双孝子喂血酬恩记〉评语》中提出:“方今新学大昌,旧人咸谓西俗寡伦理。然西哲不乏旧人,亦以今人之薄,不如古人之厚,故日为伦理小说,用以醒世。”^{[7]81}再如,《〈孝友镜〉译余小识》言:“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7]123}所以他呼吁“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7]27},以此封一隅之见、盲论之言。这些都表明林纾翻译这类人伦题材的小说,一方面意在打破因循顽固者对西方蛮夷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打碎盲目跟风者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滤镜,用以警醒中国民众,不要鄙弃优良的人伦传统,致使社会发展误入歧途。

据此可见,林纾对西学始终带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不是以先进文明的高姿态蔑视其如蛮夷,而是辩证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优势与不足,力图客观地取长避短。

三、肃风尚新的思想文化

林纾虽然不懂外语,翻译作品需通过别人口译而成,但这不妨碍他以敏锐的眼光细致体察西学的各个领域,深入西方社会各方面,将其呈现在作品中,展现给中国民众。

(一) 维新尚勇的风气

林纾译作序跋介绍西方崇尚勇的风气,欲以此扫除当时中国凋敝倦怠之气,如《〈剑底鸳鸯〉序》中追溯西方历史:“一千五百年前,脑门人始长英国,撒克逊种人虽退衄为齐民,而不列颠仍蕃滋内地。是三族者,均以武力相尚。”^{[7]75}同时他表明翻译这部小说目的是“冀天下尚武也”^{[7]76},遗憾自己才学欠缺,不能创作这样的武侠小说勉励国人,只有翻译西产英雄之外传,去除倦敝之习,追赶猛敌。这里他已经提出着意此类作品是希望国人尚武变强,抵御外敌。再如《〈黑太子南征录〉序》提及英国未开化时“尚勇重美人”^{[7]102},虽教育未普及,但奋迅壮大,然后反思当时中国荏弱的缘由。

林纾还介绍了西方人的特点,如《〈电影楼台〉序》中所说:“可知西人之性质,勇健不挠屈,有图生之业,可以无求于人,故能强耳。而犹患拥资济人者之授人以惰,故凛凛以散财为无益,必人人自立,无仰施济于尧舜,斯为强种之要图。”^{[7]90}这里他分析西方强大的因由,西方人性格强健,有图生之业,自立自强,他觉得这有益于中国社会,所以欣然翻译。

他在译作序跋中还提到西方尚新的风气,如《〈斐洲烟水愁城录〉》提及“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7]31}。可就是在如此尚新风气盛行时,西方国家仍然坚守优良的文化传统,如《〈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论及“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7]21},后又说“余今译莎诗纪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7]21},因为尚新的英国人称道莎士比亚,而国内跟风西方,一味求新的人应该不会摒弃莎氏,但实际他们却摒弃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林纾在这篇序文中暗含了对这类人的批驳。这些序跋已经在思考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于当时社会和现今中国都具有启示意义。

此外,前文已经谈及人伦风气的问题,林纾在

论及西方社会也注重伦理时将它与中国社会相比,寻求共同之处,试图消弭中西文化的高低之分,消除文化偏见,使西学更客观、全面地呈现给中国民众。如他在《〈橡湖仙影〉序》中说“余初以为硕腹之贾,爱财如命,惟吾华人然耳;今而知寡廉鲜耻,背义忘亲,所谓文明之西欧,乃大有人在”^{[7]48},所以他认为中西文明没有高低之分,可以相互借鉴和交流。诸如此类还有“欧西开化几三百年,而其中犹有守旧之士,不以女权为可”^{[7]58}(《〈红礁画桨录〉序》),他认为西方同样也有落后守旧的人;“可知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7]109}(《〈离恨天〉译余剩语》),他认为东西方文人脑力都一样,没有差别,可见种族也没有优劣差别。这样的论述,为“西学为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更充分地汲取西方经验作好了准备。

林纾始终站在中国立场,以中国之文化、以中国之国情去度量西学,这或许又显示出他没有破旧革新的一面。但不得不说,在当时中国备受欺压的情况下,在思想交杂碰撞的时期,林纾如此看待中西方文明,有利于消除文化壁垒,增强文化之间的交流,为“西学为用”提供便利。

(二) 现代爱情意识的觉醒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还诱发了现代爱情意识的觉醒。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欧洲小说体现了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其中还蕴含了现代爱情意识,这对中国几千年坚守的道德人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近则流风被于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远则下开“五四”时代那些浪漫自由的爱情咏叹调小说。

在林译小说中,对青年人影响最大、对封建礼教冲击最有力的要数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迦茵小传》。《迦茵小传》并不是英国的经典小说,但经林纾翻译后却大为畅销。这部爱情悲剧作品描写了平民女子迦茵与贵族子弟亨利一见钟情,迦茵不屈从外在压力,勇敢追求爱情,最后又为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事毅然选择牺牲爱情乃至生命,故事凄恻动人。

林纾在《〈迦茵小传〉小引》中提及蟠溪子翻译了《迦茵小传》,惜前半篇已佚,无从寻觅译者,不得不自己着手翻译,他称扬蟠溪子译作“抗词幽说,闲意眇旨”,同时也肯定了《迦茵小传》的精微深眇。迦茵这一形象,让“木强多怒”的林纾生

出无限的同情与爱怜,他以娴熟的笔力,生动地再现了小说人物的言行举止、细致心理。近代中国被西方强行打开国门后,追求个性解放、婚恋自由和向往纯爱基础的浪漫型男女关系开始涌现。迦茵冲破等级、追求平等的恋爱,无疑具有现代爱情特点,而林纾的关注也正说明他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旧婚恋观,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的《迦茵小传》却能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巴黎茶花女遗事》叙述的是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悲剧。作品描写了如茶花般美丽纯洁的少女马克格尼尔(玛格丽特)因生活所迫,在巴黎沦为妓女,后结识富家子弟亚猛(阿尔芒),两人深深相爱,有过一段平静安逸的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百般阻挠,认为他们的结合有辱家风并会断送儿子的前程,他暗中迫使玛格丽特与阿尔芒断绝关系,蒙在鼓里的阿尔芒以为玛格丽特变心,玛格丽特抑郁而终。

林纾深深被故事中玛格丽特的悲剧结局打动,在翻译中更增添了对亡妻刘琼姿的不尽思念,他不时沉浸在刻骨铭心的往事中。而合作者王寿昌也是性情中人,每遇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常常相对流泪,以致掷笔痛哭。林纾在《信陵骑客译〈露漱格兰小传〉序》中提及:“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而士大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玛格丽特)竞。”^{[7]131}他激赏茶花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表明他认同这种突破身份、跨越等级的自由恋爱,这类颇具现代爱情色彩的作品通过林纾的翻译得以传播,给当时守旧的中国带来新鲜的雨露。

上述两部小说的序跋中,林纾还没有过多地表述其对爱情的看法,但他在《〈离恨天〉译余剩语》中将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与蒋士铨《香祖楼传奇》类比,表明爱情自由的艰难,述说冲破封建禁锢的不易,从另一层面来说这也是现代爱情意识的生发。他在《〈剑底鸳鸯〉序》中简介小说内容,说女主人公意薇琴先受休鼓拉西之聘,后又毁约嫁于其侄达敏,这于中国四千年未有,后又说:“余译此书,亦几几得罪于名教矣,然犹有辩者。达敏、意薇琴始已相爱,休鼓不审其爱而强聘之……”^{[7]75}林纾自觉这个故事有违几千年来的人伦规范,但又认为男女主人公已经相爱,

这唯爱至上已经超越了封建人伦规范,带有追求婚恋自由的现代色彩,虽然未必受中国社会的认可,但“不必踵其事,但存其文可也”^{[7]76}。林纾怀着包容的心态接纳西方文学中的婚恋观,“留其善而悉去其恶,转失鉴戒之意”^{[7]76}。“其善”即指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不挠坚守,可见林纾虽守旧但并不是封建卫道士,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体现了他对西学的态度较为开明。

四、新耳目的小说观念

在文学领域,西学也给旧中国带来巨大冲击,表现突出的就是文学体式和文学语言的革命。林纾一直坚守桐城派古文的藩篱,在文学领域里他接受西学影响最大的是翻译小说,他通过译作序跋表达对被正统文人鄙弃为末流的小说这一文体的接受和推崇。如《〈迦茵小传〉小引》中说:“小说固小道,而西人通称之为曰文家,为品最贵……(作者)未尝用外号自隐。”^{[7]24}这对接受传统文学熏陶的林纾来说大开眼界,在中国被视为小道的小说在西方却备受重视,作者也不用隐去真实姓名。林纾很快接受这样的小说文体观念,积极翻译外国小说,在翻译过程中将大部分小说都作为救世良药,“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7]69}(《〈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形猷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则人人将求致名誉……孰则甘为不肖者”^{[7]55}(《〈神枢鬼藏录〉序》)。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提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8]

这样的观点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振聋发聩,小说成为政治和思想革新的载体,登上大雅之堂。可以说林纾和梁启超二人的观点已经彻底超越传统文体论,形成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文体观。

林纾在序跋中提及“凡小说之书,必知其宗旨之所在,则偶读一过,始不为虚”^{[7]97}(《〈钟乳髑髅〉序》),林纾用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来看待小说创作,即须言之有物。而所谓言之有物的宗旨,或是可以鉴戒、可以劝喻、可以醒世、可以警示中国民众的内容,或是“发宣其胸中无数之哲理,特借人间至悲至痛之事,以聪明与之抵敌,以理胜数,

以道力胜患难,以人胜天,味之实增无穷阅历”^{[7]109}(《〈离恨天〉译余剩语》),给人留下深刻的生命体验。故林纾在《〈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中提出:“西人小说,即奇诡荒渺,其中非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7]60}这些阐述涉及文体功能的赋予和文体地位的确立与提升,可知林纾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发展功不可没。

林纾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7]78}(《〈孝女耐尔传〉序》)的命题,建构了新的小说审美规范,使文学的主人公由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转为命运卑微的小人物,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时代觉醒。他还在序跋中对中西小说在思想、艺术上作了具体、细微的比照,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他对中国说部的“登峰造极”之作《石头记》(《红楼梦》)与英国狄更斯的《孝女耐尔传》(《老古玩店》)进行了艺术表现手法及特色的比较: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姬,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究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狄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狻馐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遽曲,宁可及耶?^{[7]77-78}

《红楼梦》着意写上层社会,丰富的内容和精致的构思,展现出典雅繁丽的面貌。《孝女耐尔传》更着意家常之言,虚构想象又贴近下层民众的现实生活,世俗色彩浓厚。林纾说作者“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7]77},可见写照底层现实的作品更容易引起林纾的共鸣。

综上,林纾以一种学习借鉴的态度对待外国小说,接受以小说宣扬教化的途径,赋予小说重要的现实功用,这样的文学观念已颇具现代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封闭的中国,林纾的译作犹如一股冲决堤坝的洪水,吸引了中国文人与读者的目光,纠正了清末民初人们对小说对文学的传统看法,掀起了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之风,影响了整整一代文人与读者对欧美文学的兴味。从这些方面来说,林纾是古往今来翻译文学的第一人。康有为将他与严复相提并论:“译才并世数严林,

百部《虞初》救世心。”^[9]林纾的译作也促使当时的文人作家探首域外,汲取异域之营养。林纾数十年的辛勤劳作,为中国近代文坛奉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中国文学界是自林纾开始才逐渐有了开放性的世界眼光的。

此外,必须提出的是林纾“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及他对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层面的接纳,主要源自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强调: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躅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7]5}

可见,林纾翻译这部小说的动机出自“爱国保种”的热忱,他想通过译书振作同胞的志气,让他们认识到变法图强、勤求新学的重要性。斯托夫人这部小说是一部抨击美国黑奴制的优秀小说,深刻地揭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鞭挞了奴隶制度的丑恶。黑奴汤姆的悲惨遭遇,令林纾感叹不已,他认为黄种人在美国受到的虐待比黑人还要严重,他与魏易立刻着手进行翻译。两人的翻译热情缘于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1901年前后,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华工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抢掠毒打乃至杀害,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根本无力与美国进行交涉;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之祸近在眼前。因此,两人都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向国人介绍这部揭示美国种族压迫罪恶的长篇小说,意在唤起国人的民族觉醒,以实际行动挽救民族于危亡。小说的出版发行,对反美华工禁约斗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自《黑奴吁天录》开始,林纾已自觉地把文学翻译与反帝爱国斗争联系在一起,融入强烈的爱国情感。^[10]

从多部林译小说看,林纾试图以所译介的域外小说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并以此唤醒国人尤其是青年,以所译小说之所述为鉴,促励人们为国家强大、同胞警醒而努力奋斗。1909年7月,林纾为早一年翻译的日本小说《不如归》作序,他在最后一段写道:

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噪

吠,尚祈鉴我血诚!^{[7]94}

《不如归》是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所著,也是林纾翻译的唯一一部日本小说。作品写孤苦的女孩浪子由继母抚养长大,嫁与川岛勇爵家的武男为妻,感情和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丈夫远航,她不幸生了肺病,又被对她毫无感情的婆母逼迫离了婚,最后含恨而死。林纾写序,主要是因为小说第十八章《鸭绿之战》侧面反映了中日海战的一些实际情况,他引用书中所记来说明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英勇作战情形,批驳一些不实之词。

林纾此序,主要不是介绍和评价小说,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报国”“胸臆”。林纾强调,不要因一时战败而自馁,而应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这种看法不同于失败主义,对鼓舞斗志有积极作用。林纾还重视培育海军人才,把培养人才置于制造船炮之上,其见解高于当时的洋务派。这篇序文使我们看到一个“报国无日”的爱国者的“血诚”,可歌可泣。

当然,林纾也为西方国家那些为国舍身的精神而感动,在《〈黑太子南征录〉序》中提及“英人当日之视死如归,即以国为身,不以身为身,故身可死而国不可夺。然教育尚未普及,而英人之奋迅已如此。今吾国人之脑力勇气,岂后于彼”^{[7]102}。他带着沉痛的心情发问,希冀同胞从中汲取教训以身许国,担起国家兴亡的责任。

五、结束语

林纾通过翻译小说及序跋将西方的历史、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细致地呈现在封闭的中国民众面前。他认可先进的西学,企图以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但同时又很清醒,“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以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7]84}(《〈块肉余生述〉前篇序》),他认为不能因挨打而迷醉于西方文明甚至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他较清晰地认识到中西文明中各自存在的优劣,在译作序跋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扬长补短,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取长补短。此外,林译小说序跋“西学为用”思想中所展露出的现代小说观念和现代爱情意识等,已经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新风。若揆诸当时,其“西学为用”思想比洋务派要积极先进,与维新派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同频共振,甚至较之后的“保皇派”都显得比较开明。林

译小说序跋中“西学为用”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新文化革命的一种酝酿。由此可见,林纾站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这也正是百年后我们仍然纪念

这位杰出人物的原因。若是跳出历史场域,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对西方文明的扬弃也是新时代建立中国话语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 [1] 马悦欣. 林纾英语小说汉译的序跋研究[D]. 大连:大连外国语大学,2022.
- [2] 张书宁. 林纾“译笔”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
- [3] 崔璨,李莹莹. 从林译副文本看林纾翻译的爱国动机[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3):108-111.
- [4] 郝翠屏. 从林译小说序跋看林纾的文化自觉[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9(6):44-48,87.
- [5] 郑晓岚. 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与林译序跋的现代性[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333-336.
- [6] 黄晓燕,金进. 从林纾和梁启超的分歧看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冲突[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151-160.
- [7] 林纾. 林琴南书话[M]. 吴俊,标校.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8]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4卷. 沈鹏,范增,李铎,等. 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84.
- [9] 康有为. 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J]. 庸言. 1913(1).
- [10] 朱晓慧,庄恒恺. 林纾:近代中国译界泰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90.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109页)

- [4] 郑洁,夏吉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26.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4.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7] 杨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外传播研究[D]. 长春:长春大学,202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3.
- [9] 欧庭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百年探索与经验总结[J]. 大连干部学刊,2022,38(2):12-18.
- [10] 韩庆祥. 中国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 社会科学战线,2015(3):1.
- [11] 纪中强,王一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价值、困境及体系构建[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1):17-21.
- [12] 宋航,何天平. 以国际受众为中心:计算国际传播的理念迭代、应用路径与潜在风险[J]. 对外传播,2025(3):9-13.
- [13] 张明. 新时代建构中国话语的基本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1):50-57.
- [14] 秦潇. 对外传播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1(21):9-10.
- [15] 金民卿.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3):1-7.
- [16] 李竞,谢思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传播[J]. 党史博采(理论),2014(6):10-12.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4.
-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8.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

(责任编辑:王圆圆)